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Immanuel
Kant

纯粹理性批判 (注释本)

[德]康德 著

李秋零 译注



纯粹理性批判

(注释本)

[德]康德 著

李秋零 译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德〕康德 (Kant, I.) 著；李秋零译注.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300-13983-8

I. ①纯… II. ①康…②李… III. ①认识论②先验论 IV. ①B081.2②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9938 号

纯粹理性批判 (注释本)

〔德〕康德 著

李秋零 译注

Chuncui Lixing Pip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37.75 插页 2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10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科学院版《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编者导言

本诺·埃德曼 (Benno Erdmann)

我们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之外在事实的知识，单独来看无关紧要。因为对于这种外在说明的意义的一种理解，惟有在这种说明与康德——特别是对他的学生马库斯·赫茨 (Marcus Herz) ——谈论自己工作进展的无数评注放在一起加以对照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然而，这些评注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不对其内容及其对于批判学说的总体内容的态度进行一种批判性的讨论就可以利用的。《纯粹理性批判》必须不仅仅像任何伟大的哲学创造那样从“整体的理念”出发来把握；按照康德自己反复的说明，它也比这些创造中的某一些更多的是从一个理念阐发出来的。而无论是对于这部著作的历史，还是对于这部著作的学术内容，都要说的是：赋予其建筑术上的统一性的理念，只能被正确地评价为更普遍的理念的一个环节，这个更普遍的理念把这位哲学家的三部批判的整体性结合为一个整体。

按照康德自己的大量说明，《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包括一个大约 16 年的时间段。因为在 1781 年分别致雷卡尔德 (G. Chr. Recard) 和贝尔诺利 (Joh. Bernoulli) 的信中，康德把他的批判代表作的起源与他在 1765 年接到兰贝特 (Lambert) 的建议时所做的研究联结起来，而这个建议就是与兰贝特更亲密地合作，以改革形而上学。他写信对雷卡尔德说：“中断这位杰出的人物 [兰贝特] 敦促于我，且对于我来说可能变得如此重要的书信往来，其原因在于：我当时虽然开始阐明人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那种理性应用的本性，对我来说也出现了我一直期望的不久就达到完全弄明白的新前景，此时我的思想的通报就一直拖下来了，直到我……在其

中豁然开朗，其结果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讲述的”。^①同样的时间确定产生自五个月后致贝尔诺利的信中更为详细的阐述。^②

康德实际上赋予那种敦促以什么样的意义，从一篇致兰贝特的献词的片断就可以看出来，这篇献词无疑在写下时是为《纯粹理性批判》计划的。^③

1764年初，哈曼（Hamann）就已经在康德“脑子里所拥有的”工作中，除了对“道德性”的研究之外，思念着“一种新形而上学的尝试”了。^④康德自己在一年半之后，希望不久就能够完备地阐明能有助于他为自己的陈述奠基的东西，而且建议自己的读者再次想到一部形而上学教程。^⑤在这里，大概像1764年初一样，涉及的是关于形而上学的独特方法的著作，康德在1765年底就已经决定把它再放一放，因为他在其进程中察觉到，非常缺乏他能够具体地指出〔形而上学的〕独特方法的例证。^⑥

这种猜测是否有道理，什么理念是当时所计划的著作的基础，这部著作看样子应当包含什么样的思想序列，在多大程度上它就一切迹象来看可以被视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个预备阶段，这些研究不是这里要做的事情。

康德经常并且更为强调地指出的第二个起始点，是在1769年。“69年使我恍然大悟”，他在自己的鲍姆加登（A. G. Baumgarten）形而上学手册中写道，之前的时间被他

①《康德全集》，第Ⅹ卷，253～254页。参见那里的第31封信以下。

②同上书，258～259页。〔参见李秋零编译：《康德书信百封》，83～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译者注〕

③B. 埃德曼编：《康德对批判哲学的反思》，第Ⅱ卷，莱比锡，1884年，No. 1。

④Fr. 洛特编：《哈曼著作集》，1821—1825年，第三卷，213页。

⑤关于他在1765—1766年冬季学期的讲演安排的通告。

⑥《康德全集》，第Ⅹ卷，53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17～19页。——译者注〕参见那里的第31封信。

描述为一个理念朦胧的时期。^①“大约一年以来”，日期更精确一些，他在1770年9月2日对兰贝特写道，“我可以自夸地说，已经达到了那个概念，我不再费心改变它，但也许可以扩展它”^②。康德在1783年8月16日致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信中，在他把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称为一个长达至少12年的时间段的思索之成果时，指的是同一年，并轻微地暗指先行于这一年的那个时期。^③1783年8月7日致伽尔韦（Carve）的一封信更强调一些地指出了1765—1769年的那个朦胧时期，他在其中写到了这部著作的材料的储备，他曾多达12年之久精心地思索这些材料。^④

毫无疑问，康德在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中吸收了1769年的精神成果，这里不可以探讨这种成果的前史，即二论背反问题的发展。据此，如果我们预设，1765年计划、看起来只是稍稍执行、后来搁置的作品是第一个预备阶段的话，那么，这篇教授就职论文就会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个预备阶段。

康德1771—1772年的书信中的一些通报指示着《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三个预备阶段。

康德坚持与兰贝特以书信的方式互相理解的计划。但是，如1765年就已经说过的那样^⑤，他又期望推迟，这也是因为他在1770年9月就已经出自内在的理由打算扩展和补充他的教授就职论文。^⑥他打算通过这项工作给教授就职论文加上几个印张，显然紧接着这项工作，他经过1770—1771年的冬天翻阅了关于

①《康德对批判哲学的反思》，第Ⅱ卷，No. 4。

②《康德全集》，第Ⅹ卷，93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27页。——译者注]

③同上书，323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93页。——译者注]

④同上书，316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87页。——译者注]

⑤同上书，53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17~19页。——译者注]

⑥同上书，93~94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26~29页。——译者注]

为感官世界规定的基本概念和法则之关系的所有资料，连同对构成鉴赏力学说、形而上学和道德的本性的东西的构思，对所有的东西进行了筛选、权衡和组合，由此出发，如他在1771年6月7日简短地通报的那样，只是在不久前才完成了一部关于感性和理性的界限的作品的计划，而如今则忙于详细地撰写一部以此为标题的著作。^①八个月后，康德以如下的话向他的学生描述了这项工作：“在您离开哥尼斯贝格之后，在工作和我不得不作的休息之间的间隙里，我再次检查了我们所讨论过的研究计划，为的是使它与整个哲学以及其他知识相和谐，并且掌握它[知识]的范围和界限。”对于他手中的资料，他描述如下：“对于道德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法则中感性的东西和理知的东西的区分，我已经进行过相当多的研究。至于情感、鉴赏和判断力的原则，以及它们的结果即适意者、美者和善者，很久以来，我已经构思得相当满意了。”“而现在，”他继续说，“我正把这个计划写成一部著作，标题可以是：《感性和理性的界限》”^②。

这部作品的计划远远超出了后来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内容。它符合后来的批判哲学整个体系。惟有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可以被视为后来的《纯粹理性批判》就其理论应用而言^③的一个萌芽。因为康德在这里面设想了两个部分，一个理论部分和[一个]实践部分。前者分为两章：1. 现象学一般。2. 形而上学，确切地说仅仅依据其本性和方法。相比之下，第二个部分同样分为两章：1. 情感、鉴赏和感性欲望的普遍原则。2. 道德性的初始根据。^④

但是，即便是在这里，实施也迅速地中止了。因为康德紧接着刚才引用的话给出了那个提问，它对于后来的《纯粹理性

①《康德全集》，第Ⅹ卷，117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31页。——译者注]

②同上书，124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33页。——译者注]

③《判断力批判》，前言的开端。

④《康德全集》，第Ⅹ卷，124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33页。——译者注]

批判》的学术内容的意义早就被认识到，尽管是在很不同的意义上来评价的。只不过这个提问的引论提供了一个这里值得注意的外在资料。康德解释道：“当我对〔所计划的作品的〕理论部分的整个篇幅以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加以详细思索时，我发现自己还欠缺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在长期以来的形而上学研究中，我和其他人一样忽视了这种东西，但实际上这种东西构成了揭示至今仍对自己藏匿的形而上学全部秘密的钥匙。于是我反躬自问：我们心中人们称之为表象的东西与对象的关系是基于什么样的根据？”他认为，对象自身得以产生所凭借，因而事物自身建立于其〔理智的〕直观之上的 *intellectus archetypus*〔作为原型的理智〕的可能性，与我们的感性——感性的被动表象仅仅包含主体被对象刺激的方式——的 *intellectus ectypus*〔作为摹本的理智〕一样，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包含在普遍的问题之中的疑难是随着我们的知性表象才开始的。康德如自己所说，在 1770 年的教授就职论文中讲的是：“感性的表象是按照物的表现来表象物的，而理智的表象则是按照物的所是来表象物的。”“但是，”他继续说，“如果这些物不是通过它们刺激我们的方式被给予我们的，如果这样的理智表象〔在质的关系中〕是基于我们的内部活动〔自发性〕的，那么，这些物〔如其所是〕究竟是怎样被给予我们的？理智表象与毕竟绝非由此产生的对象应当具有的一致又来自何处……？”

提及《纯粹理性批判》的理念发展史的这些资料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能够认识，它们向我们指出哲学家处在其工作的一个新的、更漫长的阶段的开端。其思维的一个重要的、还在 1770 年的教授就职论文和关于《感性和理性的界限》这部作品的计划中就坚定不移的预设对他来说成了问题。后来被他如此所谓的范畴演绎及其结论的问题对他来说产生了，并且移到了他的思维的中心。问题已经提出，他后来用如下的话来表达：纯粹知性概念如何能够与对象相关？^①

①《纯粹理性批判》，第 2 版，第 13 节。

康德思维的这种改变的外在资料很容易从上述引文得出。首先，新的提问被康德自己直接与对于《界限》这部作品的计划来说决定性的思想联结起来了。其次，它涉及关于事物如其所是的可认识性的预设，这个预设决定着 1770 年的教授就职论文中理知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奠基性划分。新的问题由此是康德于 1769 年在先行的理念朦胧时期之后开始锻造的思想链的一个环节，确切地说是一个出自自己的思维之材料的环节，是从理念的联系出发造型的，不是从外部附加的。

当然，如该信的更广泛的联系所表明的，这个环节的形式尚未完成。问题就在那里，但尚无后来的解答，从一切迹象来看根本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只不过，寻找它的道路已经得到暗示：通过后来所谓的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它系统地对范畴进行划分。然而，这种划分暂时不是按照一个后来的一般而言对象之诸概念的逻辑原则，而是按照少数几个知性基本法则^①进行的。

这个思想进步导致理念的最终版本是《纯粹理性批判》^②，当然还不是在最终的意义上。因为那个名称在这里只包括理智的〔因而并不也有感性的〕认识之源泉的研究，但有这个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它是纯然理智的，不仅是对理论认识的研究，而且也是对实践认识的研究。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这部著作发展的基础，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外在的基础。在康德自己的理解的意义上，我们据此可以区分两个发展时期：

Ⅰ **理念的朦胧时期**：1765—1769 年。我们必须把 1765 年康德提到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独特方法的作品之计划视为其代表，我们可以说，它是后来这部著作的第一个预备阶段。

关于第二个时期，我们首先在 1769 年获得出发点，康德同样把自己的作品与它相关联，此外是第一阶段从 1769 年直到 1771 年底，以及由 1772 年的提问规定的第二阶段的开端。

①② 《康德全集》，第Ⅹ卷，126 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35 页。——译者注〕

我们可以把 1770 年的教授就职论文和《感性和理性的界限》这部作品的计划设为第二个时期的这第一阶段的代表，因而视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个预备阶段和第三个预备阶段。

这个时期的**第二阶段**的外在资料为数不多。

我们从所引用的致赫茨的信中得知，康德将首先写出他当时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它包括形而上学的本源、方法和界限，然后再写道德性的纯粹原则，而第一部分将在大约三个月内出版。

该著的那个第一部分，即在清除形而上学的虚构东西之后独断地解释纯粹的知性认识，并且勾画出它的界限，就是康德从现在开始允许他……进行反思活动的间隙里所从事的工作。^①

然而，他能够迅速结束这项工作的期望却没有实现。20 个月后，在 1773 年 10 月 25 日，他写信给尼古拉（Nicolai），明显地与其作品的理论部分有关，说他当下的工作将使扩大了篇幅的教授就职论文……不久更多地得到关注。^②被认为更普遍的，是他在 1773 年底对赫茨的通报：“您经常在博览会书目中‘K’这个字母下寻找某个名字，但这是白费力气。……然而，由于我力图改造长期以来半个哲学界劳而无功地研究的那门科学〔形而上学〕，并且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收获，我自认为已经掌握了一个学术概念，它将完全揭开以往的谜，把自己隔离自己的理性的方法〔教授就职论文的实际应用〕置于可靠的、易于运用的规则之下，因此，至今我依然固执地坚持我的计划，在我把布满荆棘的坚硬地基平整完毕，为普遍的研究做好准备之前，决不受任何成名欲的引诱，去……寻求荣誉。……有时，我仍然希望能在复活节前完成这部著作。不过，即使考虑到经常发作的小毛病总是造成工作的中断，我还

①《康德全集》，第Ⅹ卷，129 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38 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136 页。

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复活节后不久，我就要完成这部著作。”^①

至于这里又指的是 1772 年意义上的《纯粹理性批判》，因而包括《实践理性批判》在内，我们是从同一封信得知的：“如果我的先验哲学〔对完全纯粹的理性的所有概念之源泉的研究〕^②得以完成，我将非常高兴。它本来就是对纯粹理性的一个批判。在这之后，我将转向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只有两个部分：即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其中，我将首先发表道德形而上学。现在，我已经在为它的即将出现而高兴不已了。”^③据此，即便在这里也包含了 1772 年的整个计划（因而排除在后来的《判断力批判》中对鉴赏的批判），因而《纯粹理性批判》只是被设想为一个形而上学整体的导论部分，而在形而上学内部，对伦理的东西的阐述作为哲学家特别喜欢的东西清晰可辨。^④

谁从这些暗示出发来诠释这封信的实际思考，就不难理解，即便是对该著之结束的新日期确定，也依然是虚构的。对于以后的几年来说，交稿几乎完全落空，这也许不是偶然。

只是三年后的一封信，即在 1776 年 11 月 24 日，才对我们吐露了进一步的情况，当然是根本的情况。康德几乎是不间断地在他所享有的闲暇里推进着他的工作：“长期以来，我似乎没有采取过什么行动，因而受到了各方面的指责。其实，我的确从来没有比您离开我之后的这几年里更加系统、更加顽强地工作过。”^⑤他完成了充满复杂的思想障碍的工作：“应当说，要坚定不移地实行这样一个计划，需要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

① 《康德全集》，第Ⅹ卷，137 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40～41 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126 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35 页。——译者注〕

③ 同上书，138 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41 页。——译者注〕

④ 同上书，126 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35 页。——译者注〕

⑤ 同上书，185 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51～52 页。——译者注〕

神。我时常受到困难的冲击，总想去献身于一种更令人愉快的题材。但是，有时是由于我克服了一些障碍，有时是由于这项工作自身的重要性，我总是又被从这种不忠实的表现中拖回来”。尽管如此，主导的理念表现为收益丰厚的：“就像人们在获得了有益的原则之后通常所发生的那样，我现在手头堆满了材料，让它们成书，可望给我带来一阵短暂的掌声。”但是，这里的成书尚付阙如：“但总的来说，这些都被一个主要的对象像一座水坝那样阻拦住了，我期望自己，能够就这个主要的对象作出不朽的成就。我相信自己，已经确实占有了这个对象。因此，目前需要做的不是把它想出来，而是把它写出来。”

毫无疑问，这里又指的是《纯粹理性批判》：“您知道，独立于一切经验原则而作判断的理性，即纯粹理性的领域必然会被忽视掉，因为这个领域先天地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不可能从经验那里得到任何启发。现在，为了按照可靠的原则，勾画出这个领域的整个范围、部门的划分、界限和全部的内容，并且立下界标，使人们今后可以确切地知道，自己是否置身于理性或者理性思维的基地上，就需要有一种纯粹理性的批判、一种纯粹理性的训练、一种纯粹理性的法规和一种纯粹理性的建筑术，因此，也就需要一门正式的科学……”

我们甚至可以说，《纯粹理性批判》在这里已经获得了狭义的措辞，它排除了过去纳入的〔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当然，这封信没有一处提到伦理学问题，这个 *argumentum e silentio*〔出自沉默的证据〕会像通常那样很少决定什么。但重要的是，康德的对这门正式的科学的环节环节的列举几乎完全符合后来这部著作的划分：这里在狭义上称为批判的部分符合后来的要素论，其他部分，即训练、法规、建筑术，符合后来的方法论的同样命名的几章。因为这里所缺少的该著方法论的最后一章，即纯粹理性的历史，在其寥寥数页中也只是设立一个标题，它处在那里，仅仅是为了标识出体系中还剩下且今后必须完成的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对思想联系投上这里必不可少的一瞥，则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刚才引用的康德的纯粹理性的措辞与

后来的批判措辞完全一致。^① 据此，它的领域如此广阔，以至于一并包括感性的纯粹原则。因此，它看起来不像 1772 年那样被限制在纯粹知识，**就其纯然是理智的而言**。因此，我们可以猜测，教授就职论文关于可感世界的讨论现在如后来这部著作那样，被纳入了批判的计划。

因此，根据一切迹象来看，我们面前已经有了后来这部著作的整体计划。

这个假说被康德的其他陈述所证实。

首先，是康德为成书给出的更长的日期规定。他在 1776 年 11 月底写道：“我并不打算在复活节前完成这项工作，而是[还]把明年夏天的一部分也用于此。”

其次，是后来的范畴演绎的基本思想和意义的暗示。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这封信的话中读出这些暗示。因为康德在这里首次谈到先天地作判断的理性，这不可能是偶然的。而说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对范畴与根据后来的演绎的判断功能之关系的一种提示，如果人们读一读，对于那门正式的科学来说，可以不使用已经现存的科学的任何东西，它为自己的奠基需要甚至完全自己的技术表述，则这种猜测就在很高的程度上是可能的。因为在这里，听起来几乎逐字逐句是康德后来描绘他的演绎的特性所使用的措辞：“这个演绎……是当时为了形而上学所能做的最困难的事情，而那里最糟糕的事情，则是**形而上学就其现存的而言，在这方面也不能给我提供丝毫的帮助**”。据此，很可能康德就那个像一座水坝那样阻拦住了他的材料的主要对象而言，特指的就是他的演绎。

与这些解释并不矛盾的是，康德在八个月后（1777 年 8 月 20 日），因而在他于 1776 年 11 月称为最后日期的那个时间，又给赫茨写道：“自从我们分别以来，以前我对哲学的各种对象逐一进行的研究获得了系统的形象，并逐渐地把我引导向整体的理念，这个理念使我首先有可能就各个部分的价值及

① 《纯粹理性批判》，A Ⅺ，B 24-25，29-30，356-357。

其相互影响作出判断。不过，阻碍所有这类工作的绊脚石，就是我称之为纯粹理性批判的东西，现在，我惟一进行的工作就是清除掉这个绊脚石，我希望，能在今冬全部完成。”^①

没有必要强调，我们即便在这里也听到完成的话，我们要想到完成的浓缩，这里仅仅涉及一种全部的完成。因为康德继续说道：“现在缠着我的事情，无非就是要努力完全清晰地表述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内容，因为我发现，人们自以为表述得极为流利、极为清晰的东西，倘若违背了鉴赏家们的习惯思维方式，也照样会被他们误解的。”

根据这一切，我们可以推论，纯粹理性批判的内在结束，即确定其本质性的思想内容，属于1776年11月之前的时间，因此，第二个时期，特别是这个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设定在这个时间，其第一个阶段上面已经在时间上可以划定界限了。

这个最终日期可以更精确地规定。因为在1776年11月，紧接着他声称相信自己已经确实占有了那个对象，因此目前需要做的不是把它想出来，而是把它写出来之后，他报告说：“在我完成我现在才开始的这项工作〔成书〕之后，在我只是在今年夏天才越过最后的障碍之后，我为自己开辟出一片无主的旷野，对我来说，在这片旷野上耕作将只会是一种娱乐。”^②

因此，依据上文，我们可以预设为很可能的是，在1776年夏天涉及的是对特别是1772年的问题的解决给康德的思维所呈现出的障碍的最终克服。因此，我们可以把这部著作的第二个发展时期的终点置于这段时间。

在1781年6月7日，康德给雷卡尔德写道：“中断这位杰出的人物〔兰贝特〕敦促于我，且对于我来说可能变得如此重要的书信往来，其原因在于：我当时虽然开始阐明人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那种理性应用的本性，对我来说也出现了我一直期

① 《康德全集》，第Ⅹ卷，198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55页。——译者注〕

② 同上书，185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51页。——译者注〕

望的不久就达到完全弄明白的新前景，此时我的思想的通报就一直拖下来了，直到我，就在他令我痛心的辞世前不久，在其中豁然开朗，其结果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讲述的。”^①由于兰贝特在1777年9月25日辞世，所以我们从这个清晰地指示着理念发展结束的时间确定出发，会宁可说1777年夏天，而说不说1776年夏天。稍后（1781年11月16日）致贝尔诺利的信对这种差异没有丝毫改变，在这封信中，在对1765—1769年的朦胧时期的内容描述之后说道：“1770 [1769] 年，我已经能够以确定的界限，完全清楚地把我们认识中的感性与理智的东西区分开来，对此，我把上述论文的要点……寄给了这位可敬的人物……。但在这时，我们认识中的理智的东西的起源——康德在1772年说理智认识的源泉——却给我造成了无法预见的新困难。我拖延的时间越长，这种拖延也就越有必要，直到这位杰出的人物出乎意料地与世长辞，我发现自己对如此重要的支持所寄予的一切希望也随之成为泡影为止。”^②我们只有义务把这个不确定的日期与致雷卡尔德的信的更为确定的日期联系起来。

然而，重要的并不是从那种差异中产生的疑虑。康德在出自1781年的这些信中没有兴趣完全精确地确定日期，以至于1776年在结束后不久所写的那封信的固定的时间规定对于我们来说必定依然是规定性的。

据此，我们把：

II 理念的最终发展时期：1769—1776年，作如下划分：

第一个阶段：感性的东西与理智的东西的分离，1769—1771年。

其代表是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和《感性和理性的界限》这部作品的计划。

第二个阶段：理智的东西的起源，1771/1772—1776年。

①《康德全集》，第Ⅹ卷，253～254页。

②同上书，259～260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84页。——译者注]

其中自 1771/1772 年，按照上面的阐述，其中《纯粹理性批判》已经以现在我们眼前的划分得以形成。

关于这第二个阶段的思想发展的进程，部分是哲学家的书信，部分是批判著作中的回顾，以及《批判》的学术内容与教授就职论文的一种比较和赫茨的出自 1771 年的说明文《从思辨的世俗智慧出发的沉思》，提供了一些材料。不过，对此的讨论属于这部著作的内在历史。

我们只需要还规定在第三也是最后一个时期，即这部著作成书时期的工作进程的外在资料。

此前，已经就我们通过哲学家的亲炙弟子和他本人所了解，以及从他的遗著草稿所能够推论，指出过他的工作习惯。

根据博罗夫斯基 (Borowski) 报道的牧师佐默尔 (Sommer) 的叙述，康德告诉过此人，《批判》的“草稿”主要是在“所谓的哲学走廊”形成的，如博罗夫斯基所补充，康德“当时经常在那里散步”。在这件轶事前面不远的地方^①，博罗夫斯基关于“康德博学的著作的莫立和构思”的报道如下：“他首先在脑子里形成一般的草稿；然后，他更仔细地加工它们；他把自己在这里或者那里要插入或者要更详细说明的东西写在小纸条上，然后仅仅把这些小纸条附在那最初匆匆拟就的手稿上。一段时间之后，他对整体再次进行修订，然后像他总是写的那样誊写干净用于打印。后来他才使用他人誊写。”^②

我们可以视之为这些报告的根本性的东西的，是康德习惯于马上书面记下他的思维的结果，并在这些草稿的基础上修订他的打印稿。而且我们可以把这种根本性的东西视为可靠的，尽管它并不属于——根据博罗夫斯基的报告——由康德审定的描绘的语境。因为为我们保存下来的讲演提纲和遗著草稿绝对证实了这种习惯。

① L. F. 博罗夫斯基：《I. 康德的生平和品性的描述》，191~192 页，哥尼斯贝格，1804。

② 另一件这样的轶事见 R. B. 雅赫曼：《书信中描写的 I. 康德》，80 页，哥尼斯贝格，1804。

至于它们在这里也适用于《纯粹理性批判》的修订，我们可以从康德书信给我们提供的各种暗示中得出这一点。即便是没有上述报告，如果我们在康德 1765 年 12 月 31 日致兰贝特的信中读到，如出版商康特尔（Kanter）从他那里获悉的那样，他也许将在次年复活节完成关于形而上学的独特方法的作品，他原想把这部作品因与自己的初衷依然相距甚远而再放一放，确切地说是因为他在写作它的进程中觉察到……^①则我们依然可以推论到一种书面修订的开端。1771 年中，康德在整个冬天翻阅了所有的资料，对所有的东西进行了筛选、权衡和组合之后，忙于详细地撰写……《感性和理性的界限》这部作品，并且不久前实现了……这个计划。^②同样，康德在 1773 年对尼古拉说的话，指的是一个书面的草稿：“不过，我当下的工作——正是按照其当时计划的《纯粹理性批判》——将使就职论文……不久就更多地受到关注。”^③这一假定愈发可靠，是因康德在同一时间向赫茨报告说：“在付出许多努力之后，对我来说，最简便易行的方法，莫过于利用几乎已经写好的、并非微不足道的作品来炫耀这个名字了。”^④即便我们必须把这些工作仅仅与出自他此后不久想到的一个更容易且更令人愉快的领域，而不是与他还有时希望在复活节完成的^⑤《批判》本身联系起来，我们却毕竟有义务把关于那些材料所说的话转用到《批判》本身。这样，康德就可以在 1776 年 11 月联系到《纯粹理性批判》而告知赫茨：“我现在手头堆满了材料，让它们成书，可望给我带来一阵短暂的掌声……”^⑥

①《康德全集》，第Ⅹ卷，53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18页。——译者注]

②同上书，117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31页。——译者注]

③同上书，136页。

④同上书，137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40页。——译者注]

⑤同上书，137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41页。——译者注]

⑥同上书，185页。[参见《康德书信百封》，51页。——译者注] 参见 582 页。